

寻找家园：1859年前后的英国博物馆与人类学

□ 张力生

〔摘要〕 民族志博物馆被称为现代人类学诞生的“机构家园”（institutional homeland）。1859年前后是英国人类学实现“进化论突破”的关键历史节点，进化论思想的提出，使得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逐渐成为“人的科学”的物质性证据。在此基础上，英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Rivers）的“类型学”（typological）民族志收藏和博物馆实践，在英国19世纪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代转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物质文化；民族志博物馆；进化论人类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

〔作者简介〕 张力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北京，邮编：100871。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23)01-0075-09

19世纪中叶，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人类学在诞生之初，曾以民族志博物馆作为其“机构家园”（institutional homeland）。^①包括泰勒（E. B. Tylor）、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博厄斯（Franz Boas）在内的人类学学科奠基人，都曾参与民族志收藏与展陈工作，甚至主持创建民族志博物馆。^②因此，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80年代也被称为“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③

本文考察的主要问题是，以保藏和展示“异族文化”为主要功能的民族志博物馆，如何成为以“有关人类的全部天性”为关怀的19世纪人类学的机构阵地。本文将视角放置在19世纪英国现代人类学形成的学术史情景中，试图在维多利亚时代众多知识—思想脉络汇集的“多声部交响”里，探寻人类学如何“寻找”其机构家园的过程。^④

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自然选择进化论宣告诞生。而这一突破得益于此前欧洲博物学、地质学、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

发现。笔者将围绕1859年这个关键时间节点，梳理进化论思想的提出如何引发了一场“民族学的时间革命”，^⑤使民族志博物馆中那些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逐渐成为重续“人类历史”，探索“人的科学”的物质性证据。在此认识论基础上，笔者分析英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Rivers）提出的“类型学”博物馆如何在英国19世纪民族学人类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他者之物”与“人的科学”

现代博物馆的雏形来自文艺复兴之后风靡欧洲的“珍奇屋”（Cabinet of Curiosities）。15世纪到17世纪，随着欧洲航海大发现以及海外殖民扩张，大量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涌入欧洲，汇聚于各国藏家手中。

“贝壳、石头、牙齿或獠牙、化石遗迹……”，带着“对神秘的奇形异状的事物”的好奇以及“审美追求”，^⑥欧洲的博物馆学先行者们将搜集到的动

① Nancy Lurie, "Museumland Revisited", *Human Org* 40 (1981): 180-87.

② 英国人类学奠基人爱德华·泰勒曾任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员（Keeper）。德国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曾参与创建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并出任馆长。有“美国人类学之父”之称的弗朗兹·博厄斯曾在隶属史密森学会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了近十年。

③ William. C. Sturtevant, "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s?" *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82. (1969): 619-650.

④ G. W.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⑤ T. R. Trautmann, "The Revolution in Ethnological Time", *Man* (N. S.) 27 (1992): 379-397.

⑥ [法] 克里斯蒂娜·达韦纳：《珍奇屋：收藏的激情》，董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植物标本、考古化石、艺术品以及手工器物等堆置一室。“珍奇屋”的出现推动欧洲自然科学迎来了“青春期”。如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 (Andre Leroi-Gourhan) 所说：“在所有文明中，科学的曙光无不诞生于‘淘宝客’乱七八糟的‘破烂堆’。”这些“奇特”的“他者之物”的大量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欧洲人对于自然物种的分类体系，也丰富了对于异文化的了解。随着博物馆学的发展，欧洲在启蒙运动时期已经出现了有关自然“演化”“进步”的观念，并且“逐步与对人的起源问题的探索紧密联系起来”。^①

然而，此时欧洲关于人与自然演化历程的理解，仍然受缚于延续自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观念：

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依然希望科学研究中证据的发现能与基督教的神学精神协调一致。在欧洲的思想里，博物馆学的发现被纳入一种神学和哲学的设计观点中考察。设计的观点认为，世界很复杂，但同时也有规则。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在复杂的现象中寻找规则。但是规则不是自然界自己建立的，而是由一个超人的智者创造出来的。源于智慧的设计，另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符合某种鲜明的结构，特别是线性链条的结构。也就是说，生物可以由最高等的，往下排列到最原始的，形成一个复合的阶层结构。文明与存在的链条概念融合起来，构成一个文化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系列。^②

即便如此，在这个“存在巨链”隐喻框架中，人的特殊性逐渐得到彰显。“人的历史”被描绘为从野蛮向文明的逐渐转变，蒙昧、野蛮的“肉体的人” (l'homme physique) 逐渐将自己从欲望与激情中解放出来，建立理性的统治，完成了从“原始的自然状态”到“礼貌而优雅的文明状态”中的“道德的

人” (l'homme moral) 的逐渐转变。^③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哲人热衷于通过推测重构这个过程，形成了所谓“推测史” (conjunctual history) 的写作传统。然而，启蒙哲学关于人类“进步”的认识，同样无法彻底摆脱《圣经》时间框架。启蒙时期的诸多“推测史”尽管已经对中世纪圣经史学形成了冲击，但仍然无法打破神创论的前提，因此对“人类的由来”问题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④

与此同时，这种“进步观念”也将欧洲以外的“他者”纳入其中，将“非西方”的“原始”社会看作是文明的初级阶段。“土著人”由于“心性的罪恶”或“理性的缺失”，^⑤ 处于文明的进程中的落后地位。“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殖民”与“被殖民”成为一系列密切关联甚至对等的二元对立。这种西方在文明进程中的“优越感”，为其在海外继续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西方殖民者对于其殖民对象的风俗和制度，起初并不太感兴趣。^⑥ 而陌生、芜杂且难以归类的“民族志”藏品，在当时也没有引起欧洲民族学家特别的关注。

欧洲早在16世纪中叶就出现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雏形。1635年在巴黎建立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被认为是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历史博物馆。^⑦ 建于1683年的英国阿什莫尔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 是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相较之下，直到19世纪初，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⑧ 才提出了关于专门建立“民族志博物馆”的最初动议。1837年，冯·西博尔德在给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的信件中写道：

①② 王铭铭：《从经典到教条：理解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36页。

③ Robert Wokler, "From L'Homme Physique to L'Homme Moral and Back",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6. 1 (1993): 121-138.

④ 张正萍：《苏格兰启蒙时期的“推测史”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1期。

⑤ Robert Wokler, "Anthropology and Conjectural History in the Enlightenment", eds. Christopher Fox, Roy Porter, Robert Wokler, *Inventing Human Science: Eighteenth-Century Domain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⑥ George Stocking,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⑦ Vincent H. Resh, Ring T. Cardé, eds., *Encyclopedia of Insects* (Amsterdam: Academic Press, 2003) 771.

⑧ 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 (1796—1866年)，德国内科医生、植物学家、旅行家，以及日本学家和日本器物收藏家。他的女儿楠本稻是日本第一名女医生。

民族志博物馆,是经过科学地整理的、来自不同地区——主要是欧洲以外——器物的集合。这些物本身,以及它们与其他物的联系,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它们所属的民族。博物馆将他们的宗教、礼仪和风俗展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对他们的艺术和科学、农业经济、手工业和贸易状况有更清晰的认识。^①

也就是说,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保藏和研究能够代表“文明成就”的艺术品,或证实自然历史的动植物标本相比,收集有关“野蛮人”日常生活与奇风异俗的器物,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满足好奇心,领略“异域风情”的猎奇之举。

为何如此?事实上,直至彼时,真正“民族学”意义上的关于“他者”的知识,仍然主要来源于对不同民族语言的比较与辨识。

民族学(Ethnology)一词由 18 世纪斯洛文尼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亚当·寇拉(Adam Franz Kollár)于 1783 年所创,直到 19 世纪初才出现在法语、英语语境中。从词源上看,英文中“民族学”一词 ethnology 的词根 ethnoi,对应希伯来语《旧约》中 goyim 一词,即英语中 gentile,意为“非犹太的”“异教的”,即基督教世界之外的。^②因此,这门研究“不同民族的起源、语言、风俗、制度”的科学,自起初便是基督教神创时间框架中的“异族”之学,这种根深蒂固的“我他之别”,来自巴别塔倒塌之后产生的“语言的混乱”(confusion of tongues)。^③依据《旧约》叙事,世上的所有民族都是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据 17 世纪爱尔兰主教詹姆斯·乌雪(James Usher)所制的基督教年表(《乌雪年表》),世界创造于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3 日礼拜天,大洪水发生于公元前 2438 年,巴别塔发生在之后公元前 2400 年左右。发端于基督教背景下的“摩西民族学”(Mosaic ethnology)主要根据语言特征,将世上的不同民族追根溯源。开创历史语言学的 18 世纪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所提出的“原始印欧语”假说便是重要的一例。^④

因此,尽管在经历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思想界已经普遍认为“原始民族”的状况能够反映文明的早期形态,但直到 19 世纪初,研究民族志器物与重塑“原始民族”的历史之间,才开始产生关联。“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这个概念方才应运而生。1843 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普莱斯哥特(William H. Prescott)在叙述 16 世纪西班牙征服南美的历史时,才首次使用“物质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一词,主张通过手工器物而非语言文字,来了解当地的历史。

而此时,欧洲主要的民族志收藏仍然是按照源地进行分类的。诸如 1837 年冯·西博尔德在莱顿主持建立的欧洲第一座民族志博物馆(也是后来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前身)——日本博物馆(Museum Japonicum)——皆是如此。换言之,对“物质文化”的认识体系依然是“地理的”。这些民族志博物馆中的藏品展现的依然是“原始民族”在“当下”的状态,主要是“土著人”的行为方式与奇风异俗。而“他者之物”对于理解与“我”有关的问题,换言之,包含“我”与“他者”的共同普遍的“人类历史”问题,尚未能真正有所贡献。

二、人类远古历史的证明与民族学时间观的转变

以上局面,直至 19 世纪初自然科学时间观念的革命之后,方才有所改变。

1830 到 1833 年间,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发表三卷本《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以均变论向居维叶(Georges Cuvier)的激变论(或灾难突变论)提出挑战。他根据现代沉积率推断出地层的沉积时间不少于两亿四千万年,而不是激变论者推断的那样短暂。莱尔写道:

如果地质学家误解了连续发生的事件的遗迹,把一千年当作一百年看待,或者把造物语言中的几百万年,误认为几千年,并据此虚妄的前提作出逻辑推论,那么,除了承认自然界曾经历过彻底大革命

① Mary Bouquet, *Museums: A Visual Anthropology* (London: Bloomsbury, 2012) 63.

②④ T. R. Trautmann, "The Revolution in Ethnological Time", *Man* (N. S.) 27 (1992): 379-97.

③ 1 世纪的罗马犹太作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也有过相似的论述,他认为这座塔的名字来源于希伯来语 Babel (בבל),意思是“混淆”。

外，不可能得出其它结论。^①

几乎与此同时，在欧洲各地陆续有考古学家发现了已经灭绝的动物化石与人类的手工造物共出，不断撼动《乌雪年表》中关于公元前 4004 创世的时间框架，将人类历史的起点不断推前。

1937 年，一桩里程碑式的发现，再次推进了欧洲科学界对人类“古老历史”（antiquity of man）的了解。法国考古学家杰克斯·布歇·德佩斯（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在发掘法国的阿布维利（Abbeville）地区一处旷野遗址时，在同一地层中发现了石器与猛犸、披毛犀的骨骼。然而，德佩斯的这一发现在一开始并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英国考古学家在德文郡布里克瑟姆洞穴的岩层中发现了石器以及已经灭绝的动物化石，才随即前往阿布维利——德·佩斯所工作过的遗址，确定了德·佩斯考古发现的真实性。^② 自此，人类的古老历史得到了证明。

1859 年，时任英国地质学会主席的查尔斯·莱尔在阿伯丁举办的第 29 届“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年会发表致辞，宣布了这一系列研究的成果，他说：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在欧洲多地的洞穴角砾岩和钟乳石中发现，人类的骸骨及手工制品与已经灭绝的鬣狗，熊，大象或犀牛的化石共出，这让人怀疑，有关人类 [起源] 的争论一定比我们迄今为止所想象得更远。这些发现本身就意味着，人类化石遗存非常古老，足以与西伯利亚猛犸象共存。^③

同时，莱尔也在这篇致辞当中宣布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将会在几个月之后出版。尽管达尔文在书中有意回避了人类起源的问题。1863 年，莱尔又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出版了《人类古老历史的地质学证明》（*The 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④ 正式提出了人类进化的历史。

19 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在一首《原始人之歌》（*Ballade of Primitive Man*）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转变（表 1）：^⑤

表 1 《原始人之歌》节译

From a status like that of the Creets, Our society's fabric arose, — Develop'd, evolved, if you please, But deluded chronologists chose, In a fancied accordance with Mos- es, 4000 B. C. for the span ...	自像克里人那样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结构出现了， 发展了，进化了，如果你愿意的话 但是被迷惑的年代学者选择了， 为了与摩西保持一致， 将时间跨度定在了公元前 4000 年
But the mild anthropologist, — — He's Not RECENT inclined to suppose Flints Palaeolithic like these, Quaternary bones such as those! In Rhinoceros, Mammoth and Co. s. First epoch, the Human began, ...	但是温和的人类学家... 他不是最近才倾向于认为 像这些的旧石器时代的燧石， 还有那些第四纪的骨头！ 在犀牛、猛犸象和其他动物的 最初纪元，人类便已经出现，

1873 年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的时候，人类的远古历史就已经被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开篇即说：

地球上之有人类，始于太古时代，这一点已是确实无疑的了。但其证据直到近三十年来才被人们发现，而且，这样重要的一个事实直到我们这一代才开始被人们认识，这倒似乎有些奇怪。

现在已经知道，在冰河时代，甚至上溯到冰河开始以前，欧洲即已有人类生存，他们的起源多半是在更前一个地质时期。与人类同时生存的许多动物已经灭绝了，人类却继续生存下来，并且在人类的若干支系中都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经历和它的进步同样值得我们注意。^⑥

人类学家费边（Johnnes Fabian）认为，莱尔与达尔文等人的工作推动了 19 世纪欧洲学界由中世纪

① 孟迟：《莱伊尔和〈地质学原理〉》，《中国地质》，1984 年第 2 期。

② [英] 保罗·巴恩：《考古学：关键概念》，陈胜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③ "Repor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item/96146#page/7/mode/1up>, accessed on 28th Nov 2022.

④ Charles Lyell, *The 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2009 [1863]).

⑤ 据朗格自陈，这首诗的灵感来源于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本文中所引用的这两节的最初版本便出自泰勒之手。

⑥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

神学时间向现代的科学时间的“质的飞跃”。^① 自此,“人的历史”的时间线被嵌入到理解整个地球生命历程的自然科学时间框架当中。用摩尔根的话说:“因为人类所可能经历过的时间与地质学上的时代相关联,所以无法用有限的时间来衡量它。”^② 自此,对人类起源的理解不再受限于基督教神学的短年表,而是被科学证明是与自然界在同一个更长的时间框架里。

那么对人类学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摩尔根说:

上述的知识,使得一向流行的关于蒙昧人与野蛮人、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关系看法大为改变。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有力的证据断言,人类一切部落在野蛮社会以前都曾有过蒙昧社会,正如我们知道在文明社会以前有过野蛮社会一样。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③

如此一来,随着这场现代民族学的时间革命,进化论者眼中的民族志器物便不仅能反映不同民族“当下”的生活状态,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窥探整个人类的技术和生活方式如何由“简单”到“复杂”,由“幼稚”向“成熟”不断演进的过程。由此,进化论学说影响下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便将关注点由 18 世纪比较语文学传统中的“词”,逐渐转向民族志博物馆当中的“物”。那么,如何对民族志器物进行收集、拣选和分类,并构建一套系统与秩序以发现其中的规律,便成为进化论博物馆人类学实践的关键问题。

三、皮特一里弗斯:从火枪到回旋镖

在 19 世纪的人类学博物馆中,最精准表达进化论学说的是由英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奥古斯都·皮特一里弗斯建立的收藏以及博物馆实践。

奥古斯都·皮特一里弗斯,原名奥古斯都·亨利·雷恩-福克斯(Augustus Henry Lane-Fox),皮特一里弗斯(Pitt-Rivers)是他在 1880 年继承远房亲戚的一笔巨额遗产后,所承袭的贵族亲戚的名字。皮特一里弗斯生于 1827 年,青年时期加入英国陆军掷弹兵卫队,1845 年任少尉。1851 年,他开始负责试验和报告军队滑膛枪性能。随后,他主要负

责在肯特郡建立一所火枪学校,并修订《火枪教学》(*Instruction of Musketry*)手册。同时,他开始广泛收集民族志类物品。

受到火枪的工艺与形制不断发展变化的启发,皮特一里弗斯的收藏兴趣开始集中于不同民族的武器,并观察其演变的“缓慢过程”。他很早便明确总结出了自己有关民族志收藏和分类的两个原则:“形式的连续性”(connection of form),以及“功能的统一”(functional affinities),即相关陈列应反映满足同样功能的同一类器物,如何在形式上不断演进的过程。^④

皮特一里弗斯对研究器物演化过程的兴趣既是出自军人的职业习惯,也跟他对科学的兴趣有关。如前所述,皮特一里弗斯生活的 19 世纪中叶,是一个科学风起云涌,充满突破和发现的年代。1853 年,他与政治家爱德华·斯坦利男爵的女儿爱丽丝·玛格丽特·斯坦利(1828—1910 年)结婚,并通过斯坦利家族的关系,成为达尔文主义的热烈追随者。皮特一里弗斯还跟当时活跃的思想界和科学界的进化论者约翰·卢柏克(John Lubbock)、T. H.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写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恰好佐证了他自己在收藏当中所坚持有关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原则。^⑤

四、寻找机构性家园

随着收藏规模不断扩大,皮特一里弗斯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博物馆,对自己的藏品进行系统地分类与研究。为此,他频繁活跃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科学界,1861 年加入伦敦民族学会(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1863 年加入伦敦文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in London),1864 年加入考古学学会(Institute of Archaeology),1865 年加入伦敦人类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而以上的每一个学术群体,对于当时所流行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的都有所不同。可见,在为自己民

① Joh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③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3 页。

④⑤ William Chapman, "Arranging Ethnology: A. H. L. F. Pitt Rivers and the Typological Tradition", ed. G. W.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18—19, 20.

族志收藏寻找机构性家园的过程当中，皮特一里弗斯也亲身参与着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形成过程中的学术论争和机构探索。

以成立于1843年的伦敦民族学学会为例，其前身是1837年成立的英国“原住民保护协会”（Aborigine Protection Society），是以“保护、研究与教化”殖民地原住民文化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组织。1863年，以人类学家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人”（anthropologicals）宣布脱离了民族学会，创立伦敦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亨特将人类学定义为“研究全部人性之科学”，^①与作为“有关人种的历史或科学”的民族学相区分。

皮特一里弗斯认可亨特致力于拓展人类学学科视野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亨特重视民族志藏品作为研究工具的重要性，并希望伦敦人类学学会帮助英国“建成一个无愧于这个国家的民族志博物馆”。然而，两个学会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分歧：民族学会的成员即“民族学人”（ethnologicals）倾向于支持达尔文发表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并且政治态度比较自由。而以亨特为首的“人类学人”（anthropologicals）反而对达尔文主义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于殖民地的原住民文化存在较强的种族主义观念。^②

因此，1865年皮特一里弗斯加入伦敦人类学学会之后，仍然主要与信仰进化论志同道合的“民族学人”共事交往，并一同于1871年成立了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for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这个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主导的全新机构在1907年被允许冠以“皇家”名号，也就是今天的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RAI）。由此，皮特一里弗斯在19世纪中后期，见证并且参与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英国人类学所经历的建制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包括理论的论争，也包括不同机构发展演变。然而，尽管皮特一里弗斯担任主席长达四年，却未能达成建立自己的博物馆的夙愿。因为当时的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仍把物质文化作为描绘异文化的补充。而皮特一里弗斯所主张的，以物质文

化作为探索人类演进历程的主要手段，在当时的学界依然是十分超前的。

五、类型学的分类体系

另外一个现实难题也阻碍着物质文化认识论地位的转变。如前所述，19世纪初，作为整理与展示物质文化专门机构的民族志博物馆刚刚诞生，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尚无专门的分类及陈列体系，散落在艺术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或流转于古董商及收藏家手里。

冯·西博尔德上书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后两年，1839年，当克里斯蒂安·于尔根森·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于被任命为国立艺术博物馆馆长时，他接管了建于17世纪的旧皇家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并需要从中为新的民族志博物馆挑选展品。这其中包括17世纪丹麦探险队从格陵兰岛带回的狩猎工具、创作于1654年4个格陵兰人的画像，来自北美和南美的烟斗、羽毛饰品、武器，26幅真人大小的巴西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画作，尼日利亚象牙雕刻，安哥拉篮子和纺织品、武器和装饰品，奥斯曼帝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纺织品、鞋类和陶瓷……^③民族志藏品分类之难可见一斑。30年后，当皮特一里弗斯联系当时英国唯一拥有大型民族志藏品的大英博物馆时，才失望地发现，足足62箱藏品当中大部分被标记为“杂项”（miscellanea）。大英博物馆的民族志收藏体系仍停留在“珍奇室”的时代，被皮特一里弗斯毫不客气地形容为处于“软体动物”的进化阶段，对科学研究与公共教育“没有丝毫助益”。^④

同时，初现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志博物馆，已经对民族志材料的科学分类做出了重要尝试。其中形成最早且影响最大的，便是前文中提到的冯·西博尔德创立的荷兰国立民族志博物馆。冯·西博尔德以藏品来源地理区域为分类。分类的起点便是“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属地、中国、日本”。每个区域之内，藏品又被分为三个大类（表2）。第一大类，科学物品，包含印刷品、书籍、手稿及考古发现；第二大类，民族器物，藏品数量最多，展示

① George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247.

②④ William Chapman, "Arranging Ethnology: A. H. L. F. Pitt Rivers and the Typological Tradition", ed. G. W.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23-24.

③ Mary Bouquet, *Museums: A Visual Anthropology* (London: Bloomsbury, 2012).

风俗习惯以及技术和工艺的发展状况。其中,又以从简单到复杂,分为“原材料”“简单手工制品”及“复杂手工制品”。第三大类,以模型方式表现,房屋及其他建筑,以及生产生活工具。^①

表 2 冯·西博尔德的藏品分类

科学物品	印刷品、书籍、手稿和木刻 图纸和图片 硬币、纹章 考古发现
民族器物	动物、植物和矿物原材料、食品、药物 皮肤、毛发、羽毛; 丝绸; 软线; 稻草、树皮、芦苇; 纸; 纸质人偶; 木头; 雕刻作品, 象牙, 骨头, 角, 鳞片; 金叶; 涂漆和镶嵌作品; 陶器、砖块; 瓷器和玻璃; 石头; 金属等 服饰; 宗教物品; 武器; 乐器; 数学、外科或测量仪器等
模型收藏	房屋及其他建筑(磨坊、桥梁、堤坝和水闸) 海事、消防等设备 农业、渔业等生产工具

与冯·西博尔德的“地理系统”几乎同时,法国地理学家 E·F·乔马(Edme-François Jomard 1777—1862 年)在 1845 年提出了自己的“民族志藏品分类计划”(plan d'une classification ethnographique)。乔马曾参加拿破仑领导的埃及远征团,从 1828 年起,任巴黎国王图书馆管理员,负责皇家珍玩收藏以及自 19 世纪初从各种探险航行中获得的民族志材料的保管与征藏。与冯·西博尔德一样,乔马也致力于改进贵族珍奇室一般的杂乱无章的保藏方式,思考如何能让这些材料为科学发展所用。受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影响,^② 乔马提出了由“纲(classe)、目(ordre)、种(espèce)、变体(varieties)”组成的四级结构——第一级包括衣食住行等十个功能类别,接下来按活动类型划分,例如武器、农具;武器又继续细分为狩猎武器、战争武器等,只有在最后的“变体”一级,才按照地理区域进行划分。

在借鉴既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皮特一里弗斯正式着手整理和发表他关于原始武器的民族志收藏

的研究,并发展出了自己的类型学(typological)理念。他分别于 1867、1868 和 1869 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三场关于“原始战争”的系列讲座。第一场讲座主要关于早期工具和武器是如何通过“无意识选择”的过程从自然形态中不断发展出来。皮特一里弗斯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共有一些基本的防御和进攻机制,人类制造的最初的武器来源于动物形态(鹿角作矛,龟壳为盾)。然而自此以后,武器的发展经历了“自己的历史”,即形式的演化。他相信器物形制的发展,能够阐明人类文化进化的过程与原则。他写道:“(进步)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我们无法知道最终呈现什么图案,但我们知道这个游戏根本的规则是序列(sequence)。”^③ 这次讲座旨在说明,器物是探究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绝佳佐证,因为其物质性,甚至比语言、文字更能真实地反映种族发展的阶段。皮特一里弗斯认为,基于此可以重构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

而如果要重构,便需要解释形式的“进化”如何发生。皮特一里弗斯在第二场演讲中提出,器物形式的变化是通过不断的“变异”(variation)实现的,即通过“连续复制中的错误”(errors in successive copies)的反复积累,每一次“进步”都经历了无数次“无意识”的修正。^④ 由此,便可以还原某些具体的历史序列,比如某种武器的形式衍变。

“连续性”(continuity)是皮特一里弗斯类型学当中的另一重要概念,也是他在第三讲中的重点。他在第三次讲座中转向“金属工具的起源和发展”,回应了考古学界关于人类的“单一起源”还是“多地起源”的争论,并提出尽管金属生产本身的知识可能是单独出现的,但更精细的合金冶炼技术则更有可能是从一个族群向另一个族群传播的。

关于原始武器的三篇演讲奠定了皮特一里弗斯的分类原则,即以外部形制特征的演变为依据标准,对人工制品进行分类与排列,以展示人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

1874 年,他与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ings-

① Mary Bouquet, *Museums: A Visual Anthropology* (London: Bloomsbury, 2012) 31.

② 乔马的“比较系统”受到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中“界(règne)、门(embranchment)、纲(classe)、目(ordre)、科(famille)、属(genre)、种(espèce)”的分级体系的启发。

③④ William Chapman, "Arranging Ethnology: A. H. L. F. Pitt Rivers and the Typological Tradition", ed. G. W.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31.

ington Museum) 达成合作, 在位于东伦敦的贝斯特格林 (Bethnal Green) 的南肯辛顿博物馆新馆举办长期展览。在这里, 他首次实践了自己的类型学分类法, 并在 1874 年发表了《分类原则》(*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 一文, 针对自己的类型学分类观做了更加理论化的阐释。

皮特一里弗斯在文章中介绍:

该系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涉及体质人类学。它由一小部分典型的头骨和种族毛发组成。这部分收藏, 因为它涉及一个人类学家大量关注的主题, 而且有很多比我更能干的人研究这一领域, 所以我没有深入。该系列的其余部分专门用于展示史前和野蛮文化发展的物品, 包括第二部分: 现存野蛮人的武器; 以及第三部分: 现代野蛮人的各种艺术, 包括陶器和陶器的替代品; 导航工具、纺织面料和织物; 个人装饰品; 写实主义艺术; 传统艺术; 装饰工具; 家具; 乐器; 偶像和宗教标志; 种族文字特征样本; 马具; 货币及替代品; 火器; 各种较小的类别物品, 如镜子、勺子、梳子、玩具, 以及现代野蛮人的一系列工具, 以展示石器的制作方式。第四部分涉及史前系列, 包括模拟人工形态的自然形态标本, 以与人工形态进行比较; 一系列现代复制品, 用于与真正的史前器物进行比较; 旧石器时代器物; 新石器时代器具; 青铜、铁和骨制器具。^①

皮特一里弗斯坦陈, 与珍奇屋时代的民族志收藏不同, 类型学博物馆实践的纯粹是为了科学研究和公共教育。在这类博物馆中, 选择“普通但典型的标本, 而非稀有的标本, 并将其按顺序排列”, 是为了“尽可能地追溯在原始文化条件下, 人们的思想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一系列演变过程”。

1880 年, 皮特一里弗斯从远房亲戚——男爵里弗斯二世处继承了巨额的遗产, 以及位于萨利斯布里 (Salisbury) 面积达 3 万平方英里的庄园。^② 他继续扩大了类型学的收藏, 其藏品数量可能超过 2.2 万件, 于 1882 年捐献给了牛津大学, 并于 1884 年成立了皮特一里弗斯博物馆, 牛津大学也随之设立了第一个人类学教席, 由时任牛津大学自然科学

博物馆馆员 (keeper) 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出任, 后来泰勒也成为英国首位人类学教授。

皮特一里弗斯在晚年的时候, 又对博物馆展示和分类提出了新的思考。1889—1890 年, 皮特一里弗斯在索尔兹伯里的布莱克摩尔博物馆做了题为《关于艺术博物馆的使用与营建》的演讲, 并提出了自己关于民族志博物馆展示的理想型, 即“人类学的同心圆” (*anthropological rotunda*):

我的计划是有一个大型的圆形大厅, 如附图所示, 其展柜应以同心圆排列。内环将展出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物品, 其中包含最少、最早和最简单的石器, 占据的空间最小。下一个圆环将专门用于新石器时代的器具, 由于它们的相对复杂性和数量, 将占据一个更大的圆环。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罗马、撒克逊、早期英格兰和中世纪时期将占据连续的环。全部圆环的外部将展示现代艺术, 以此表现它们与古代艺术的发展之间的联系。

任何参观者如果了解艺术或自然历史中的某一点, 或了解他正在研究的主题, 只需注意到他自身的站位与圆形大厅中心和圆周的位置关系即可, 而不必去看那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目录参考。

虽然未能实现, 这便是皮特一里弗斯对于进化论人类学博物馆的最终构想。通过一个“人类学的同心圆”, 将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用空间表达出来, 观众只要站在博物馆里, 就可以知道自己在人类进化的历史当中的位置。

六、结语

皮特一里弗斯一生的学术实践, 凝结了 19 世纪中后期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相互支持与倚重的历史, 反映了进化论人类学对于物质文化研究的推崇。而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之后, 另一场人类学的理论变革在英国发生。由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带领的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理论逐渐取代进化论, 在方法论上由物质文化的分类收集转向社会结构的参与观察。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在 1915 年至 1918 年间进行田野调查时积累了大量的

① Augustus Pitt-Rivers, "O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Procs", *Roy. Inst* (7): 496—520.

② 皮特一里弗斯所继承的遗产, 为他带来的年收入总额估计超过 27 000 英镑, 税后 22 858 英镑, 在 1900 年皮特·里弗斯去世时, 他的财产总估值为 414 586 英镑。后来他的相关研究者将他个人的财富折算成 2010 年的财富值大概合 2000 000 到 2700 000 英镑。

物质文化材料,但马氏还是坚定地将自己主张的社会人类学,与他所称的博物馆当中的“博古人类学”(antiquarian anthropology)明确地划清界限,批判古典人类学田野工作对物质文化的“纯粹技术热情”。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人类学经历了博物馆人类学和“学术”/“学院”人类学的逐渐分野,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心逐渐离开了博物馆,向大学这个新的“家园”转移。

本文回顾19世纪中叶,非西方世界物质文化的民族志藏品如何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在1859年前后,伴随着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提出以及地质学、民族学时间观念的革命,英国进化论人类学彻底打破了19世纪初欧洲基督教的历史观,将对“他者之物”收藏与“人类历史”的探究逐渐联系起来。这个人类学“进化论”的突

破,并非发生于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经历了民族志时间观念的转变之后,人类学家面对民族志材料、看待来自他者之物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进化论的方法去拣选、排列、展陈来自“他者”的物质文化。

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史节点,民族志收藏与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发展的两条脉络发生了交汇,为我们呈现出学科史的一种社会性。作为共同体的19世纪人类学,是其前后众多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民族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的的工作所积累和碰撞的整合。追溯博物馆在人类学史当中的作用或者角色,系统地理解这个学科的变化,离不开对关键历史时刻的社会性解读。 [责任编辑 李青蓓]